

爱知大学 ICCS 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分组的总结

张琢 周星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中国文化与亚洲·世界的文化共生”研究会自 2003 年创办以来，先后举办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 16 次较小规模的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报告会和讲演会。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的成员主要有日本、中国（包括台湾）、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与此同时，我们还以聘请国外学者来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学的方式，把有关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传授给在校学习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文化”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需要和可以研究的方面很多，可以从多视角去划分。若是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可以分为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和处于基础地位的大众或民间文化，本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对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本文仅就 2003-2006 年度 ICCS 先后举办的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文化分组的学术讨论情况予以总结，以便为 ICCS 的中国文化研究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

2003 年 11 月在名古屋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讨论的主题为“新启蒙、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现代化讨论及后现代问题”，反映的主要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的论争。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为题作了基调报告，他指出，19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的突显，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三种不同的思想价值趋向：第一种为知识分子中新右翼的观点，认为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他们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第二种是自由中间派，认为只有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第三种观点即新左派，他们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萧功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论争的三种前景做了预测：第一种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第二种前景是激进新左派与现代化过程中受损的下层绝望阶层相结合，发动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运动，以求在中国重建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两极震荡，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阱。最后，他强调：中国虽然充满矛盾，但经济发展态势基本良好，出现现代化断裂的可能性不大，发生后两种趋势的概率并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以《老革命的新觉醒》为题，对以《炎黄春秋》杂志为园地的中共党内老革命家、理论家中民主派的思想 and 政治动向做了介绍，她分析说：该杂志不少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是中国政治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从青少年时期追随共产党，长期以来习惯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同程度上也接受专制主义影响，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鲜有个人的自主意识。“文革”浩劫和共产党的屡次失误，使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动摇、彷徨和重新找回自我，现在再度举起他们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帜，力求从体制内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人是共产党的补台派而非拆台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根底的情况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提交了重要论文《文化、政治与经济搓揉下的中国现代化》，他认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与 19 世纪的满清中国一样，当代中国推动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对 18 世纪以来的西

方启蒙理性文明的一种反应，仍然是在既有传统文化模式的支撑下进行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开始于资产阶级借“平等”、“自由”的口号向既有的主导政治势力争取“公平正义”，现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则基本上是始于政治与经济势力的大结合，更恰当地说是政治渗透经济，把后者纳入其既有的运作理路之中。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格中内涵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它势必促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临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而这又是贯彻公平正义所必须考虑的基础。美国夏威夷大学 Kate Zhou(周晓)副教授在以《与国家的妥协：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为题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左翼和右翼均主动致力于把自己和历来作为国家附庸或批评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拼命与之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双方特别是左翼又不得不作为国家的批评者而行动。她认为，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曾影响并重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已经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复归变得困难。但她担心，新左翼人士大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新左翼的影响，正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威胁，或许会从根本上弱化市场经济之自由的基础。日本神田外国语大学兴梠一郎教授以《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为题，对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争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不仅是学术论争，其背景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自由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建立宪政，实现言论与结社自由，实施多党制，保护私有财产。新左派则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倾向。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正的愤怒，但对何为原因则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由主义者在一党专制中找原因，新左派则归因于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自由主义明确提出以实现宪政为目标，新左派除批判资本主义外，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兴梠一郎明确指出，目前妨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是“政治”，不解决“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很难持续发展。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以《当代中国的“公正”与“正义”》为题，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线索，将这场论战分为1994年后、1997年后和1999年之后三个阶段。爱知大学周星教授以《“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为题，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截至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面临着如何确立和提升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这一基本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将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之后，陆续有从事民族学和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加入本研究会，文化研究会的研究领域和邀请与会的学者也相应向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拓展。2004年10月在名古屋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讨论会的主题为“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国民统合与文化多样性”。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内各个地域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入发展，同时，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在政府通过媒体和资讯等手段控制社会的力量空前增强的情况下，以国民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为指向的社会大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但人们的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依然顽强存在，并不断通过文化等各种方式来寻求表达。这就是目前中国复杂而充满张力，丰富而又生机勃勃的多民族文化格局。第二次国际研讨会的主旨是着重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尝试接近和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向，聚焦于关注国民文化的建构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以《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为题作了基报告，他指出，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帝国或所有的世界体制

大都是在追求统一、一致，都致力于排斥异己和多样性，这样的历史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平衡，文化多样性也有利于维持世界的和平。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政府在开发西部以改变少数民族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制定各种政策，想方设法保护西部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尽管如此，在城市经济所推动的地区之间、族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很多传统文化的因素会在这种互动中发生变异，甚至流失。目前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流失的状况加剧。第二、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人为的旅游设施建设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服务行业和游客造成的环境污染，文化项目开发中存在的猎奇取向等，都对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三、族际互动交流中的文化适应与摩擦。特别是随着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在逐步摆脱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应地也增强了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在城市生活和汉族群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某些传媒报道、文学描写、影视作品和生活接触中也存在着猎奇、想像、曲解、甚至侮辱性的成分，由此引起的少数民族群体性、地区性反应明显增多。第四、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性取向问题。在汉族聚居地区，区域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强化了维护文化边界的观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维护强化着族群边界意识。这种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特点，一方面无法抗拒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又在努力维护和塑造地方的和族群的文化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现代化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现象。郝时远认为，中国当代的民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族际互动日益密切和广泛的时期，民族关系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内容也更加具体化和富有多样性，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整合时期。但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也会继续增多。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同质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要通过强化多样性的观念来消弭矛盾。承认文化差异的目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强调各个文化类型的天然独立性。此外，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横山广子副教授以对云南省大理市农村白族的调查为例，分析了中国的葬礼改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爱知大学松冈正子教授根据对四川阿坝地区羌族的调查，考察了国家意图的“国民文化”与少数民族自身认知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分析了中国游牧文化的特征；台湾东华大学吴天泰教授介绍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教育实践；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及其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刘新教授、爱知大学周星教授、高明洁副教授和铃木规夫教授，还分别对“民族性”、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有关方法问题、多民族的复合社会结构、现代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

2005年12月在中国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国际讨论会，主题为“国家、宗教与文化——中国文明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围绕现代化的有关问题”，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16位学者提交了学术论文、报告或发言提纲，集中探讨中国的宗教现象，梳理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报告和论文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1）关于“宗教史、宗教文化及思想史”，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宗教现象。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在题为《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的报告中指出，元朝蒙古统治者之所以把藏传佛教提升到近似国教的地位，主要是想借助藏传佛教来保持蒙古文化本位，以便与汉地汉文化形成抗衡，而正是元朝的这种宗教政策，历史性地导致了今天中国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并存关系。日本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在其论文《近代中国和天主教本土化》中认为：西方列强庇护下的“保教权”运动导致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间的隔阂，义和团运动之后到中国农村传教的雷鸣远神父为消除这种隔阂，重新组建了较为重视中

国教民主体性的教会组织“公教进行会”，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博士以《在宗教与政治之间》为题，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佛教革新运动以及两岸的佛教交流情况后得出结论说：在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大陆的佛教、台湾本土佛教和日本佛教之间其实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韩国鲜文大学吴在环教授在题为《〈大同书〉宗教思想的现代意义》的报告中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及其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思想色彩，其中有些主张如男女平等、合约同居、社会福利等，现已在一些国家变成了现实。

(2) 关于“宗教特点、民俗宗教与宗教政策”，主要是揭示现代中国各种宗教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民俗宗教”属性，进而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国家宗教政策所存在的问题等。爱知大学高明洁助教授的论文《一神教本土化的合理性：以中国伊斯兰教为例》，集中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后形成的重要特点，如明清以来以儒学对伊斯兰教进行再解释、本土语种穆斯林集团的形成、政治和宗教的“二元忠贞”、某种程度上与多神教（萨满教）的并存等。她指出，对于真主和“天子”的二元忠贞与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传统及其多重认同意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在题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国家及中国伊斯兰教的非政治性》的报告指出，和世界其他的地区或国家相比较，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非暴力和民间性的特点，在世俗领域，中国穆斯林从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国家权力，政治倾向较为温和；虽然在历代官方“儒释道”三教并重政策下，伊斯兰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官方同时也多对伊斯兰教持一种宽容态度。与此同时，中国穆斯林各教派间的分歧，基本上也不是政治分歧。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以《近代国家与宗教镇压》为题，对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日本和中国宗教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民众参与，最终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家统合；后者的“破除迷信运动”则遭遇民众抵抗，最终不得不有所妥协和变通。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在其报告《中元节的产生与盂兰盆节》中，基于他本人在台湾汉人社会的实地调查，对中国的中元节和日本的盂兰盆节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这两种节日以共同的信仰为背景，供养从地狱里解放出来的亡灵，但在礼仪内容方面却分别以普渡和祖先祭祀为主，各有不同倾向。这篇报告实际上讨论了道教和佛教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渗透进民众生活的问题。爱知大学周星教授在《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的报告中认为，在具体的社区层面不能对民众生活中的不同宗教或信仰活动予以平等的保护，是现行中国的宗教政策需要改进的问题。他提出，不应把广大民众的各种民间信仰视为“迷信”，而应将其看作是和所谓“普遍宗教”或“世界宗教”具有同等意义的“民俗宗教”，进而在国家宗教政策中增加“民俗宗教”的分类，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民众信仰生活提供合法的保护。

(3) “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视角与方法”，亦即如何理解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整体性以及研究中国宗教现象的方法论问题。日本首都大学（东京）渡边欣雄教授在《作为“术”（手段）的宗教》的报告中指出，仅从西方的宗教观出发，无法理解扎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民俗宗教现象，如萨满教、风水等。但是从宗教行为体系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生活，则可发现中国的宗教职业者都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共同体系中以不同手段开展其宗教活动的，中国人将这种手段称作“术”。他试图在西方的宗教观之外对宗教做出新的定义，认为作为“术”的宗教不仅不是“非宗教”，甚至可能是更具有“普遍性”的宗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查德·麦迪逊（Richard Madsen）教授在题为《更恰当地理解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从欧洲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宗教研究和中国的现实之间缺乏对话，由于中国知识界和政府已经接受了宗教研究的欧洲模式，这就使得他们常常难以了解自身社会，有时导致悲剧性的后果。西方及亚洲学者只有从中国历史入手，而不仅仅是以西方既定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宗教现象，才有

可能创造出更新颖、更合理的解释方式，来理解现代世界中神性与世俗性的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在题为《建立中国学之宗教问题的思考》的报告中，分析了梁漱溟关于儒学“似宗教非宗教”的论断，认为在面临信仰危机的今天，中国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儒学立为如同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国教，但可以充分发挥儒学“似宗教”的一面。他认为，加强对儒学的“宗教精神”的研究，也是建设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此外，在 2005 年度的天津国际会议上，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李翔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还分别在他们的论文提纲或发言中，涉及到“世界文化观照下的现代中国学研究”、“以‘中’释‘中’”和“贴近生活，发展中国思想史特色”等方面的论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教授的论文，比较研究了日中两国的国家与社会的特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民教授以天津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多元性问题。

2006 年 11 月在名古屋召开的第四次国际研讨会，文化方面的主题是“改革·变革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去和现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迁，始终伴随着革命、改革和一次次社会及政治运动，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清末及中华民国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如何认识近 30 年来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正是本次研讨会与会各位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东京大学并木赖寿教授在其报告《清末政治社会变革论与日本》中指出，清末的所谓“光绪新政”曾引起日本关注，日本不仅借义和团问题出兵，还通过各种方法试图影响当时的“变法”，20 世纪初日本的这些动向确实曾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的论文，题为“文本中国与生活中国：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她通过对清末民初一个士大夫日记的解读，指出其思想文本世界是固守传统理念的，而其文化生活世界则是既钟情旧学，又喜欢汲取新的知识并参与新式文化活动，这种亦旧亦新的状态说明当时所谓的保守势力也有其与新时代相互调和呼应的层面。论文揭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矛盾以及他们以旧道德安置心灵，以新知识应付世变的基本姿态和困境。东京女学馆大学藤谷浩悦教授以“湖南省的辛亥革命和民众”为题的论文，通过对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湖南省流传的有关姜守旦的“谣言”进行追溯研究，揭示出支撑着辛亥革命的民众，实际上具有和政治领导人和党派的纲领不同的世界观和愿望；民众那些包括末日到来、救世主降临和大同世界显现的世界观及其愿望，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却被隐蔽到了历史的真相背后鲜为人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纳尔多·斯莱斯基 (Ronald Suleski) 的论文题为“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他指出，从 1912 年至 1949 年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政府形态从帝制到议会制的转变，文字标记方法向白话文转变，大众和民俗文化的变迁（以剪辫、废除缠足和新式婚礼等为例）以及新的技术体系的导入等。而在 1949 年之后的新中国，除过极端排外的“文革”十年，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都有了持续和变通性的发展。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的报告题为“第五次围剿和国民党的行政及治安组织改革”，他指出，国民党从 1933 年 9 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之所以取得摧毁中央苏区并迫使红军主力转移的成功，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政治七分，军事三分”的综合政策，例如，在农村实行保甲制，强化地方保安团等民兵组织，使之和国民党正规军有所配合；在行政组织方面，在省县二级制中间导入行政督察区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从而强化了对红军活动的机动性反应。他认为，这个时期的行政和治安组织改革对后来直到 1949 年的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县委书记·县长’的实际状态、其属性和阶段性的变迁”，通过对《新编中国地方志丛书》中大量“县志”的有关资料的检索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知县或县令的任命，一般不从本地出身者中选择，任期以

不到三年为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毛泽东时代基本坚持了异地任用原则，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生改变，邓小平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了任用当地出身干部的情形，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官吏异地任用的传统，但此种新的地方干部格局也是导致地方官僚腐败和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因之一。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的变迁过程。其最突出的变化是经济体制上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这种转型相伴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府职能、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迁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于从大众世俗文化生活到上层精英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爱知大学张琢教授的报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概观”，总体上勾画出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化现象出现和演变的社会背景；然后着重对文化构成中处于神经中枢地位的学术文化作概括性介绍。前者以时间为顺序，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用代表性指标及各个时期的国际反应与评价，描绘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化现象发生与演变的背景轮廓。后者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复兴状况的概观。述评的主要学科是：人文学科领域的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法学研究。所涉各学科内容主要限于其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副教授提交的论文，题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户口、阶层和流动机会的获得”，该文运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户籍制度的有关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户籍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对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仍很显著，而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却也构成中国社会生活民主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侧面。爱知大学松冈正子教授的报告，集中讨论了四川藏区基层农村因为年轻人长期外出打工，同时也由于西部大开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所导致的人口移动和村落稀疏化、老龄化等现象，她指出，正是由于人口的移动而给偏远的藏族山村带来了许多新生事物和新的价值观，从而促使当地村民的生活也日趋“现代化”。报告还涉及国家政策所能提供给藏族村民的“致富模式”以及他们保守的婚姻习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爱知大学高明洁助教授的论文，以内蒙古畜牧业地区的“苏鲁克”制度为线索，讨论了牧区蒙古族社会之“过去”和“现在”的关联性。作者依照时代顺序，逐一地描述了内蒙古畜牧业地区作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苏鲁克”(suluke)制度的内涵及其变迁，揭示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协作体系的基本属性。爱知大学周星教授的论文“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里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简称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论文在指出古村镇热潮的都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并进一步揭示了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此外，论文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及旅游开发条件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从以上对四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初步总结可以得知，本研究会所理解或涉猎的“文化”范畴与学术领域的确非常宽广，但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中国文化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和不用同角度与层面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相信这将构成我们以后进一步努力前行的基础。

2007 年 1 月 21 日